



骏马奖作家观察(五)

古典重铸与空灵美学

——金仁顺小说论

□任淑媛(满族)

在当下的文学现场,如何在叙写边地空间和民族情感的基础上,产生可以和世界对话的文本,是以文学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非常紧迫的命题。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当代文学需要有效继承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潜心寻找资源,激发理论思考,实现文明互鉴,进而创作出传统、民间、时代和世界相互映射的多面向经典文本,这也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命题

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的文学创作体裁丰富,主要涉及小说、散文、戏剧(独幕剧为多)、电影剧本等。她的小说创作辨识度非常高,戏剧冲突较为明显,独角戏的成分也较高。其特点主要有:一,善于从民族民间文学和古代经典文本中寻找素材,颇有古意,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作出了深刻思考。二,写东北,尤其是以长白山为地标。短篇小说《白色猛虎》以长白山为中心,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将中年单身女性的生存状态、代际冲突、心理活动及其细节勾勒得入木三分。三,聚焦女性生存的独立意识和生命意识,尤其是女性的成长、精神危机和生活困境,比较有冲击力。张爱玲、迟子建、王安忆的小说都有些苍凉在里面,金仁顺则比较强调女性的自我完善,对男性的凉薄写得也很节制,又力透纸背。这一点实质上贯穿了金仁顺的全部创作。四,艺术水准较高,适于影视改编。金仁顺的语言修辞,体现出很高的艺术修养和文学功力,古典抒情意味浓厚。五,文化影响力较大,在韩国受到广泛关注,其作品通过汉语表达民族意识,成为连接中韩文学交流的桥梁。

金仁顺总体产量并不大,包括话剧等在内,大体不到两百万字。从其创作年表看,每年平均3到5篇。从目前学界对金仁顺小说的研究情况看,金仁顺已由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70后美女作家”之一,成长为当代实力派作家,和魏微、乔叶、付秀莹、戴冰、阿袁、滕肖澜、叶弥等作家一起被讨论。有评论家认为“她总是从情感关系这一看似逼仄的单筒透镜凝视这个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狭窄的”,笔者认同这一点。一切从情感出发,从感情结束,归于独立与平淡,或许这就是生活的本质。

民间故事的重构与古典文本的承继

对传统文化与当下生命形态的关联问题的深度思考,是金仁顺整体创作的重要特色之一。金仁顺在小说中大量借鉴了东北地区尤其是朝鲜族的民间故事、传说、神话等元素,但要义并非故事本身,而是通过对这些元素的创新性改造,赋予其新的生命和意义。这和“文化寻根”的文学思潮或许多有些勾连。

长篇小说《春香》不仅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重要奖项,而且有世界文学面

相,是一部和世界对话的作品。《春香》是对朝鲜经典民间故事《春香传》的现代性重构,出彩的地方在于金仁顺解构了传统叙事,将古典爱情传说置于当代社会语境中,进而展开对性别权力、个体生命的欲望本质、民族地区文化身份等话题的多重探讨,既传承了原作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又在叙事、人物形象、主题等方面,以现代性思维进行重构,展现出女性的独立与自我救赎。小说同时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民间生活习俗与细节,增强了作品的民族和地域特色。

新时代以来,对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现象,如阿来的《格萨尔王》、陈继明的《敦煌》、次仁罗布的《乌思藏风云》、梅卓的《神授·魔岭记》、尼玛潘多的《在高原》等作品,展现出了当代文学在人类学、社会学方面积极进行探索的重要特质。作家们通过对历史的再现与重铸,为当下读者提供了静心探源中华文明的“大历史文本”,提供了于文学的抒情传统中感受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历程的阅读经验。金仁顺深谙民间文学的审美内涵,在重铸历史的过程中,更注重对民间文学文本的重述与现代性建构,尤其多从女性视角呈现问题,其文本与民间文学的抒情传统与精神谱系连接较为紧密,进而建构起独特的叙事美学特征。

《高丽往事》《盘瑟俚》《僧舞》等作品,多以朝鲜半岛的李朝或高句丽时期为背景,以其节奏浓缩的语言来勾勒凄美惨淡的情感,宛如一幅幅清寂冷艳的古代仕女画,或如“阿里郎”“盘瑟俚”,需要蹙眉低吟,方可共情故事背后的文化意蕴。这些作品凸显了金仁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但也不刻意躲避古代朝鲜族的等级文化及其对今天的影响,从中既可以看到金仁顺的民族认同,也能看到她的理性思考和大胆揭示,对于读者了解和认识朝鲜族文化的生命魅力给出了清晰明确的指向。

在当下的文学现场,如何在叙写边地空间和民族情感的基础上,产生可以和世界对话的文本,是以文学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非常紧迫的命题。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当代文学需要有效继承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潜心寻找资源,激发理论思考,实现文明互鉴,进而创作出传统、民间、时代和世界相互映射的多面向经典文本,这也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命题。少数民族作家需要适时、适度、适宜地挖掘和转化文化资源,这种尝试迫在眉睫。



作为意象与象征的长白山

金仁顺不仅通过重构古代经典和民间传说来借古喻今,其对以长白山为中心的东北地域文化的呈现,也是很有特质的。金仁顺有明确的女性生存的独立意识和生命意识,无论题材是古代的还是当下的,是高句丽还是今天的长白山,是有关民族生活经验还是有关东北文化特质,是城市知识女性还是走出乡村的女性,对于其中的不合理景观,金仁顺皆保持着清醒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有些时候甚至是冷峻的,对于女性的精神危机给予最大限度的叙述和描摹。无论写什么,都有一以贯之的思想深度和极具阅读快感的张力。

金仁顺将长白山及其所代表的东北地域作为主要的叙事背景,从这种文化呈现中,可见金仁顺内心对地域文化的深度认识和理解,进而讨论这片土地上人的生存境况和情感之殇。金仁顺的小说中有自然的长白山与人文的长白山,在《白色猛虎》等作品中,能看到森林、猛虎、母亲、孩子,以及与其相关联的人与情义。长白山是齐芳内心世界的映射,长白山和猛虎既是意象也是象征,山势、峰顶以及猛虎,都是齐芳必要的精神修炼。《白色猛虎》不仅探讨个人的情感经历,还映射出现代社会的多重冲突,人与人之间的信

任、理解和尊重是小说的核心议题。通过种种复杂的情感关系,小说展现了代际关系中的矛盾。长白山的神秘与奇幻,也是复杂人际关系与情感纠葛的象征和隐喻。现代人在情感和理智之间挣扎,面临种种困境,生活中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齐芳需要独自坚强地面对每一天,展现出现代人的巨大孤独和独自面对无比强大的外界的能力。

长白山是东北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象征。金仁顺通过笔下的人物与故事,展现了长白山在东北地区人民心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它在文化传承与历史演变中的重要角色。金仁顺注重对东北地域文化的充分展现,在故事中深度描绘东北人的精神风貌,为我们理解东北地域文化提供了独特视角与深刻启示。

对人性的透悟和理性呈现

金仁顺的小说创作,在情感、结构、社会洞察方面,呈现出冷峻空灵的审美风格。她用女作家的视角观察人世间,但也不完全是一种女性视角。金仁顺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探讨,对代际关系的零度观察,既有女性立场,又有客观思考,超越了性别视域的局限,展现出一种超越性别的智慧与洞察力。其对人性的深入剖析和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充分说明,如果单纯从女性意识出发来讨论金仁顺,显然有些窄化作家的视域。

金仁顺的小说在主题上多维且深具古典人文气息,在描写人性的复杂方面,甚至比男作家更为理性。《盘瑟俚》借助神话传说,反思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水边的阿狄丽娜》叙事纯熟,视角多维,让读者在时间的流转中感受深沉与绵长;《桃花》的特色不在故事,在于对生命质素的捕捉。这些小说多聚焦女性的情感、婚姻、家庭及代际冲突等问题,这种主题上的选择,很容易令读者不由自主地考虑其女性立场,而忽略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对女性心理的深层刻画,确实更容易凸显女性意识,但实际上,其作品所蕴含的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对现实困境的深度观察,对人性的透悟和理性呈现,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女性视域。

大体而言,金仁顺的作品,以其古典与现代交融的美学意蕴、冷峻空灵的叙事风格,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文本。对金仁顺小说中的东北地区尤其是朝鲜族等民族的民间故事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东北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也为我们审视和理解金仁顺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视角。同时,这种研究也有助于推动民间故事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灵感来源。

(作者系宁夏大学文学院教授)

游走在族群与城市之间

——评阿兹乌火诗集《纸上风景》

□张永刚

阿兹乌火对生活的感悟与表达不是沉浸与静守的方式,而是动态的方式。他游走在族群与城市之间,两种充满反差的生活,不断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就像他在诗集《纸上风景》自序中所说:“地下天上,都是诗的旅途,人生到处有诗。”这“人生到处有诗”的感受,“地下天上,都是诗的旅途”的自信,集中表达了阿兹乌火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力求超越本民族文化视域的跃动的心灵。

在阿兹乌火身上,不仅烙印着彝族的文化基因,还烙印着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智。许多时候,他是以后者姿态出场的,尽管他在“一个乌蒙山中的彝族山寨生活了十八年”,将“出生地视为人生的神殿”(《坐动车回故乡》)。因此,当他提笔写诗时,离不开现代生活和文化身份给予他的观察视点。实际上,由于久居城市,原生态的彝族生活和文化,在他笔下往往只是一种记忆的参照,但它们总是有意无意呈现在许多诗作中,丰富了诗人的表达空间,使游走成为其诗歌的一个重要标志。

游走的动态性和丰富性,是《纸上风景》的显著特点。直观看,游走首先是行动。正是游走的力量,促使诗人不断提笔写作。他足迹所至,目光所及,几乎事无巨细、景无大小都可随手入诗。他写昆明的天气,也写京城的文化;写滇北的苍凉,也写西湖的美丽。想从取材角度来窥见阿兹乌火的写作取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给他提供写作资源的游走范围十分广阔,既有作为普通人的率性漫步,又有作为学者的学术旅行;既是喧闹都市中匆匆过客的所见,又是宁静彝乡里归家故人的感叹……读《纸上风景》,你会看到诗人总是在游走中取材,用游走来获得写作的宽广空间。

游走更是一种精神的追求。阅读过程中,我总在思考:阿兹乌火到底是怎样理解凡俗生活与诗性之间的构成关系?难道每一种现象都带着构成作品的诗性因素?彝族的生活特色与文化精神在他的写作中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我知道阿兹乌火十分认同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一句格言,“方圆二十里是我的写作界线”,意思是再伟大的作家都离不开一个具体的写作根基,阿兹乌

因。

以《又上大山包》为例,可以看出阿兹乌火理性思考与表达的方式。诗人将对自然、生命和历史的感悟融在一起,使大山包这个云南昭通的真实大山改变了客观性,成为理解人生的一个意象,涵容着时间流逝、历史变迁在人心灵上留下的多重意义。作品以“大山包,始终是装在我灵魂里”开篇,将这片壮阔的土地比作一幅永不磨灭的中国画,既表达了人与土地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系,也揭示了自然景观对人内心世界的深远影响。在诗中,阳光下的悬崖峭壁象征着自然的坚韧,也暗示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脆弱。当羊群睁开“纯粹的眼睛”,友好地注视山外宾客,动物的象征意义开始显现。在大自然遭遇不幸的时刻,黄牛嚼着石头,听到草在地心发芽的声音。牛的形象和羊群一样,鲜明表达了生命的顽强和希望,而“当年被宰杀的那只绵羊/在时空转换的秩序中/或许投胎成人,夜深人静/讲述着人与羊的故事”,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关联,生命在循环中展示出某种宇宙秩序。这就从哲学层面为这首诗增添了理性意义,促使读者去领悟生命与世界之间的微妙联系。阿兹乌火的创作因此成为连接日常生活、大自然、人的生命等的桥梁。在他笔下,那些看似平常的生活场景总会析出某些意义的痕迹,充实于形象之内,构成一幅幅有意味的生活画面。

当游走的创作像蒙太奇一样滑过我们的视野,阿兹乌火也就实现了丰富的表达。自古以来,诗与远方相连,诗性的展示在于对生活的沉浸与超越。如果说在族群与城市之间游走的“纸上风景”已经体现出超越意义,那么这种超越就是在民族文化与现代意识之间发生的。在理解《纸上风景》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参照的视点与思路,而不是就手法等因素进行孤立把握,不然,在那些变形的表达中,我们的知解力可能会遇到阻碍。阿兹乌火也许意识到了这种阻碍,他说“这景色好不好,那是别人的事”,写作是个人的行为,原则是诚实地表达。读完《纸上风景》,我想说,这也是我所认同的一种感受。

(作者系曲靖师范学院教授)

新世纪以来,西藏文学在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蓬勃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全球化浪潮与地域性叙事激烈碰撞下,西藏的作家们,包括藏族、汉族以及其他各民族作家,扎根高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使命担当,用充满真情和挚爱的在地性书写,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展现了当代西藏文学的多元化面貌。这些作品不仅向读者传递了正能量,还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奋斗实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西藏文化繁荣和社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藏近年来的青年写作,发展态势良好。洛桑更才正是其中一员,这位来自西藏山南的青年诗人,以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深刻的文化思考,在当代中国诗坛崭露头角。他的诗歌创作深深植根于藏族文化的土壤中,西藏山南这片丰沃的土地,赋予了他独特的文化基因。至今为止,洛桑更才相继推出了《流浪的八廓》《半个夜空》《高原的光》3部诗集。这充分展现了他旺盛的创作才能。

洛桑更才的诗歌常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构建起一种强烈的张力,他用近乎绝对对理性的视角关注人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挣扎,在他笔下,现实世界往往是复杂而沉重的。从《流浪的八廓》的“流浪叙事”到《半个夜空》中的“自我和解”,再到《高原的光》中的“智慧之光”,他的诗歌创作始终在为这种张力寻找支点。“支点”这个物象不仅是作为构建诗歌意境的手段,还是他诗歌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农民在地下种下朴实与偏见/商人在扎基拉姆与观世音之间寻找支点/知识分子在钱包和尊严里流窜……如此不同,如此一样”。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等看似毫无关联的片段,却以“让存在者存在”的方式,共同构成一个破碎的现代世界。面对破碎的世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观察、欣赏。尝试理解自己亦是这个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的快乐、痛苦、惆怅/都是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我存在与与否他们说了算”。也只有解决了这点,才有发现“美的可能性:‘开始懂得山水的善良/向着太阳张开翅膀/关心窗前的小花和天气预报/夜空下,

寻找诗歌的支点

——洛桑更才的诗性世界
□尕旦才让(藏族)

一个人也不觉得寂寞”。《半个夜空》的后记则更加验证了这种思考:“拥有的东西大多喜欢稍纵即逝,相比之下过程更有魅力。换句话说,如果我能做到享受过程,其实就是获得了某种平静,也是一种豁达。”如果说《流浪的八廓》道出了“我的破碎”,《半个夜空》则拾起了这些碎片,并在《高原的光》中,对这种张力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度剖析与阐释。作者期望每个读者能够让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得以显现,在充满张力的现实世界中切身感受到生命的重量与温度。是的,不管何种表达,艺术作为人类情感与精神的载体,自古以来便承载着表达与治愈的双重使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艺术的表达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核心目标始终指向一个方向:为人们带来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洛桑更才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展现出一种对语言的敏感性。他的诗歌语言简洁而富有爆发力:“夜色逼近窗前/向屋里借宿/失声的人/正追逐着俏皮的文字/脸是太阳/头发是河流/四肢也长满了结尾”。这当然离不开诗人对日常场景的细腻捕捉和超现实的想象,这样的句子将抽象的情感与具象的意象相融合,展现出语言生成的无限可能性。比如,洛桑更才诗里出现的雪山、石头、河流等意象,充满了生命感,而这生命感显然是基于藏地传统观念中对存在的深刻理解。如果从这个视角去思考万事万物,就不会有陌生化带来的隔阂,而是只剩下诗歌本身,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

洛桑更才的诗歌创作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藏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更通过对现实与理想的思考、对生命的敬畏与感悟,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他以诗歌为媒介,连接了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正如他在诗中所写:“我要了杯不太会喝的咖啡/你点的是冰柠檬/我们谈论记忆,写下未来/又恢复宁静”。洛桑更才的诗歌,正是这样一杯独特的饮品,让读者在品味中感受到生活的苦涩与甘甜,感悟到生命的美好与意义。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